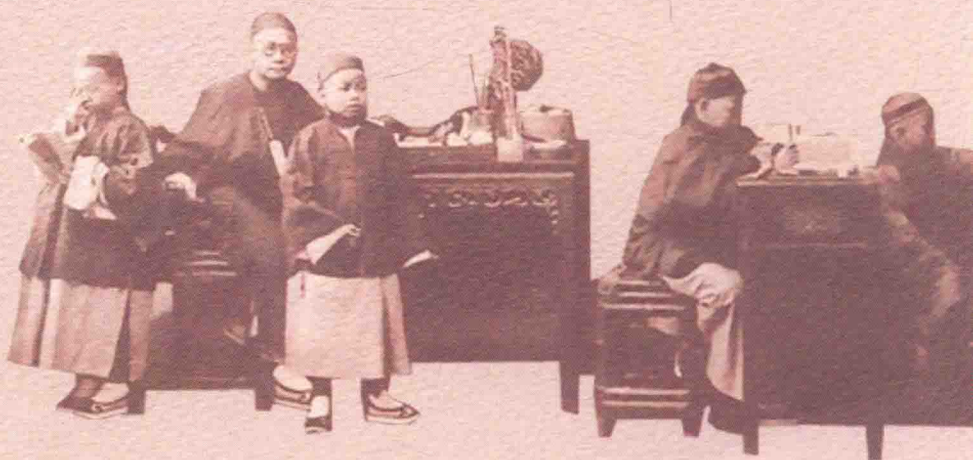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高峰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蒋纯焦 著

中国私塾史

Zhongguo Sishu Shi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蒋纯焦 著

中国私塾史

Zhongguo Sishu Shi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高峰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私塾史/蒋纯焦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7. 1
ISBN 978-7-5440-8312-6

I. ①中… II. ①蒋… III. ①私塾-教育史-中国 IV. ①G629.2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2937号

中国私塾史

ZHONGGUO SISHU SHI

责任编辑 郭志强
复 审 刘晓露
终 审 薛海斌
装帧设计 薛 菲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0351-4035711 邮编:030002)
印 装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48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0-8312-6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351-7337712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历程 1

- 一、从“家有塾”说起 2
- 二、汉魏的“馆”“舍” 7
- 三、唐代私塾的兴起 13
- 四、宋元私塾的发展 18
- 五、明清私塾的鼎盛 21

第二章 类型 30

- 一、散馆 31
- 二、家塾 36
- 三、村塾 41
- 四、族塾 43
- 五、义塾 45

第三章 教学 54

- 一、塾舍 55
- 二、读书之序 58
- 三、诵读之法 61
- 四、书写 65
- 五、算术 68
- 六、属对 70



七、作文 72

第四章 读物 76

一、字书 77

二、伦理道德读物 89

三、历史读物 96

四、文学读物 101

五、常识读物 106

第五章 塾师 111

一、为什么做塾师? 112

二、塾师的延聘 117

三、富不教书? 125

四、不只是束脩 132

五、社会活动 137

六、日常生活 141

第六章 生徒 148

一、入学年龄 149

二、学规 154

三、体罚 163

四、人生出路 169

第七章 冲击 176

- 一、新式学校的发生发展 177
- 二、兴学堂废科举 183
- 三、私塾与学校并举的二元结构 198
- 四、私塾的衰退 203

第八章 改良 210

- 一、为什么要改良私塾? 211
- 二、谁来改良私塾? 212
- 三、如何改良私塾? 222
- 四、成效与不足 240

第九章 消失 253

- 一、私塾最后的历史命运 254
- 二、私塾命运的原因分析 261
- 三、私塾消失的两重意义 270

参考文献 281

后 记 295



第一章 历程

我们展开中国教育史来一看，便知私塾的过去，的确有很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自周秦直至明清二千多年中间，私塾皆有不断的活动……

历代大儒，没有一个不是私塾出身，同时没有一个不曾当过塾师。我敢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繁衍，私塾要算是中国文化的播种者。这并不是为私塾夸张其辞，实际上他们名垂史册，谁也不容否认。^①

——吴寄萍：《改良私塾》

“塾”作为教育机构的名称，始于西周。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教育的下移和科举制度的形成，唐代以后，以“塾”命名的私家教育机构逐渐多起来。经过宋朝的大发展，“私塾”已成为中国教育的主体力量。到明清时期，私塾教育达到顶峰，遍布城乡。然而晚清以降，传统私塾受到新式学校的强烈冲击，逐渐衰微，到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消失。我们先大致回顾一下古代私塾的发展历程，至于私塾在

① 吴寄萍：《改良私塾》，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第3页。吴寄萍是民国时期一位不起眼的学者，曾官至四川省大足县知事。《改良私塾》是一本影响不大的小册子，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的“义务教育丛书”之一，主编为浙江省教育厅第四科（社会教育科）科长赵欲仁。吴寄萍的上述一番宏论虽然讲得太满，但私塾历史悠久，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



近现代教育转型中的历史命运，将以专门章节来探讨。

一、从“家有塾”说起

以“塾”指称教育机构，最早见于《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说明在《礼记》成书之前，“塾”已成为教育机构的名称。班固认为，《礼记》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① 郭沫若则进一步认为，《学记》是战国后期孟子的学生乐正克所作。^② 基本可以推测，孔孟的后学们在追述前代学校教育制度时编写了《学记》篇。因此，这里的“古”可能是指西周或殷商时期。

“塾”字是怎么来的？据裘锡圭考证，“塾”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在殷墟出土的卜辞中，有多处提到了塾。塾在卜辞中作“孰”，为上下结构而非左右结构。裘锡圭认为中国房屋建筑中的门塾之制，早在商代就已经存在。^③ 《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说文解字》：“塾，门侧堂也。从土，孰声。”经书中“塾”字最早见于《尚书·顾命》：“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前。”这四句话讲的是西周时期臣子到宫廷朝见君王，不同规格的车停放在室外的不同位置。“塾”之义在《尚书》中即为宫门两侧臣僚等候朝见的地方。

古人命名很有讲究，为什么谓门侧之堂曰“塾”？《三辅黄图·杂录》云：“塾，门外舍也。臣来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

① 《汉书·艺文志》。

②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③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参见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①清顾震福《隶经杂箸》甲编卷下也解释说：“臣朝君至门外，当就舍更详熟所应对之事。塾之言熟也，是塾本以熟思得名。”就是说，“塾”字兼取了“熟”字的音和义。臣子们为了在君王面前灵活应对，事先要想好说些什么，如何说，问下来又如何答，以免出差错。到了宫廷，臣子利用在侧堂等候的时间将自己要禀报的事项再默默熟悉一遍。



万世师表孔子

由此可见，“塾”的本义重心不在教育，而是房屋建筑，指门侧之堂。在政府机关里，门侧之堂可为预备等候之用；在民间，门侧之堂用来干什么呢？一是吃饭的地方，《仪礼·士冠礼》云：“具饌于西塾。”

^①《三辅黄图》：古代地理书籍。作者佚名。清朝有毕沅、孙星衍校本。主要记载秦汉时期三辅的城池、宫观、陵庙、明堂、辟雍、郊畤等，间涉及周代旧迹。各项建筑，皆指出所在方位。



二是出入应对之所，由长者在此交代人们一天行为的注意事项。这种告诫逐渐演化为一种教育行为，“塾”到后来也就引申成为教育场所，即如《学记》所言。我们可以推测，商周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塾”慢慢地从专指房屋的一部分引申为一种教育机构。这与“庠”“序”的含义变化是完全一致的。

“家有塾”又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学记》的原意，“序”“庠”“塾”都是依地方行政区划级别的大小而设的教育机构，只有“学”才是中央教育机构。党和术（遂）都是地方行政组织，这没有疑问。郑玄注曰：“《周礼》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党属于乡，遂在远郊之外。”但“家”就不同了，不像是地方组织的名字。怎么解释？郑玄并未纠缠于此，转而注“塾”，说：“古者仕焉而已者，归教于闾里，朝夕坐于门，门侧之堂谓之塾。”还说：“塾音熟，一音育。”郑玄虽然只讲“塾”而不言“家”，但提供了“塾”的另一个读音，而这个读音直指“教育”，说明“塾”因引申为教育机构，连读音都发生了变化。可见字义的变化会带来字音的改变。

直至唐代，孔颖达才对“家有塾”作了较为完整的解释：“《周礼》百里之内，二十五家为闾，同共一巷。巷首有门，门边有塾。谓民在家之时，朝夕出入，恒受教于塾，故云‘家有塾’。”^①原来，“家有塾”是指二十五家共一塾，并非家家有塾。《周礼·遂人》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鄴，五鄴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也就是说，“二十五家”可称“里”（有时称“闾”，上述郑玄的注乃“闾”“里”并称）。但是，《学记》为什么要说“家有塾”，而不直接说“闾有塾”

^①《十三经注疏》（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1页。



或“里有塾”？这倒是值得进一步探讨。^①或许，正是“家有塾”之说，使“塾”后来真正成为私家设立的基础教育机构的代称。

有人认为西周“塾”是“闾”办的学校，与“序”“庠”同属乡学。^②其实，“塾”不可能是严格意义的学校，其性质不能与“序”“庠”混同。我们从郑玄的注和孔颖达的疏可以推测，塾中的教育活动是在朝夕出入之时。即是说人们早晨出去劳动和晚上归来时，由塾中经过，长者顺便在此进行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提醒与训诫。“塾”没有专职的教师和学生，实施的是一种教化活动，有德行的长者承担教育者，全体居民为受教育者。《汉书·食货志》对这种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有着具体而形象的描述：“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吕思勉进一步分析说：

一邑之中，有两个老年的人做领袖。这两个领袖，后世的人，用当时的名字称呼他，谓之父老、里正。古代的建筑，在街的两头都有门，谓之闾。闾的旁边，有两间屋子，谓之塾。当大家要出去种田的时候，天亮透了，父老和里正，开了闾门，一个坐在左塾里，一个坐在右塾里，监督着出去的人。出去得太晚了，或者晚上回来时，不带着薪樵以预备做晚饭，都是要被诘责的。出入的时候，该大家互相照应。所带的东西轻了，该帮别人分拿些。带的东西重了，可以分给人家代携，不必客气。有年纪、头发花白的人，该让他安逸些，空手回来。到冬天，则父老在校室里，教训邑中的小孩子，里正则催促人家

^① 毛礼锐先生说，《周礼》云：“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这倒是更明白地说明了塾为“闾”所设。参见毛礼锐：《虞夏商周学校传说初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② 俞允海：《乡学至私塾：“塾”义变迁考》，《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缉绩”。住在一条巷里的娘们，聚在一间屋子里织布，要织到半夜方休。^①

吕思勉已基本将“塾”中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表达得相当完整，意在日常教化，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专门化教育，因此，我们也不能称西周时代的“塾”为专门的教育机构。



山东曲阜孔林万古长春坊（1907）

毛礼锐认为，“塾”“序”“庠”，都不能认为是学校。他说：“塾”实际上差不多是一个岗哨，早晚有父老里正坐在那里，看守并教喻出入的人们，例如规定“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又规定要按年龄大小排列次序，不能“相逾”。同时规定年老的不提不挑东西，由年轻人负担。“庠”是行乡饮酒礼的地方，“序”是行乡射礼的地方，都是一种社会教育机关，不是真正的学校，只有“校”可能是真

^① 吕思勉：《中国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2—73页。



正教学的地方。^①毛礼锐还推测,“塾”的初义只是门侧之堂,后来有钱的人家便利用它来作私塾,所以这种私塾又有称为门馆的。这种家塾可能始于战国或汉时。^②

《学记》将“塾”“序”“庠”“学”列为“古之教者”,意思是很久以前就有了。熟悉教育史的人会发现,在春秋战国众多教育家关于教育机构的言论中,找不到“塾”,而“序”“庠”“学”等倒十分常见。如《孟子·梁惠王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荀子·大略》:“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据此,也说明“塾”作为教育机构而言,似乎并没有得到先秦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二、汉魏的“馆”“舍”

作为教育机构的“塾”在《学记》中始现,但《学记》接下来并没有对“塾”作分析展开,而将论述的重心完全移到了“学”,即大学教育。郭沫若认为,《学记》言“大学之道”,与《大学》相表里。^③到了汉代,很难找到以“塾”见称的教育机构,“序”“庠”倒有所保留,但使用最多的是“学”“校”。如:班固《东都赋》曰:“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

① 中国古代教育史编写组:《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② 毛礼锐:《虞夏商周学校传说初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③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仁。”^①元始三年（3）夏，王莽奏：“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②《后汉书·儒林传》的议论中曾提到“塾”，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此处“黉”“塾”并称，系泛指基层学校。

汉代私学较为发达，既有初级的书馆，也有高级的精舍。与“塾”起初为非正式教育机构不同，“馆”“舍”乃专门的教育机构。以馆命名教育场所，可能源于《孟子·告子下》：“可以假馆，愿留而受业于门。”后来，人们以“馆谷”指代塾师授徒的收入。

书馆教育是汉代私学教育的基础部分，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习字，然后在此基础上初步读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孝经》等），为下一阶段的学习（如专攻经学的精舍）作准备。王国维《观堂集林·汉魏博士考》云：“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书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③王充《论衡·自纪》有一段关于书馆的记载：“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答，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多。”^④王充

①《文献通考·学校考·郡国乡党之学》。

②《汉书·平帝纪》。

③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④陈东原根据王充的受教育经历，将汉代私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识字与学书，相当于小学。第二阶段为习《论语》、《尚书》，相当于中学。第三阶段为专门经学，相当于大学。”参见陈东原：《中国教育史》（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六岁始，由父亲启蒙识字，八岁到书馆受师训，书馆教育结束后，进入经学教育阶段。既然书馆“小僮百人以上”，可见有一定的规模，不受闾里所限，可能招收方圆数里甚至数十里的学生。



山东邹县孟庙（1907）

反映东汉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四民月令》，有一些关于乡村学校的内容。如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命女红趣织布”。^① 石声汉注云：“《篇章》是《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其中《急就》《三仓》等字书，应当学会书写，《九九》是算学初步，仅仅书写不够，必须领会、熟练。”^② 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③ 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如正月焉”。^④

① 崔寔著，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9 页。

② 崔寔著，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0 页。

③ 崔寔著，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60 页。

④ 崔寔著，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68 页。



十一月“研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① 这些材料，说明汉代学校教育有意避开春节、酷暑和农忙时节，系学年制和假期制的萌芽。

书馆的教育活动没有强制性的规定，程度和性质也参差不齐，学习内容主要有：（1）基本的文史知识和书法教育。如王充的自叙，又如《史记·项羽本纪》：“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汉书·东方朔传》：“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二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算术、历法、地理。“九九乘法表”、《六甲》《五方》之类。（3）读经。《孝经》《论语》等相对浅近易晓者。

《后汉书·文苑传上》记载有一则汉代书馆师生之间的逸闻趣事：“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也。以文学知名，教授数百人。韶口辩，曾昼日假卧，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汉代经学教育中师法家法甚严，弟子不大可能私下戏谑老师，只有在蒙学性质的书馆中，顽皮的学生才可能编出几句打油诗来嘲笑老师。

精舍多为经学大师授徒讲学之所，规模比书馆大得多，弟子常常成百上千。《后汉书·承宫传》：“承宫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后汉书·郑玄传》：“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傲，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

^① 崔寔著，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1页。



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马融弟子从得教不过来，便次相传授，郑玄也弟子成群，不输给自己的老师。



破渔网等为原料制成的蔡侯纸

严格说来，精舍并不能与后世的私塾相提并论，只有书馆能勉强对应后世塾师所开设的门馆。汉代书馆教育发达，除了经济、文教等因素，还与一项重要的发明有关。东汉时期，宦官蔡伦总结前人的经验，发明使用植物纤维造纸的新方法，一时风行全国，称“蔡侯纸”。纸使用方便，价格低廉，为文化教育和下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能入书馆受教者当不断增加。尽管史书上关于“书馆”的记载不多，但由于汉代地方官学中缺乏蒙学教育机构，因而青年、儿童多半就学于私学性质的书馆。这样，私学在数量上超过了官学，其中蒙学占主

